

临海东观

明清史学中的日本 研究与认识

LINHAI DONGGUAN

Mingqing Shixue zhong de Riben Yanjiu yu Renshi

时培磊◎著



科学出版社

临海东观

明倫堂中
書院
藏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时期有关日本的史籍研究”

(11CZS002) 结题成果

临海东观

明清史学中的日本 研究与认识

LINHAI DONGGUAN

Mingqing Shixue zhong de Riben Yanjiu yu Renshi

时培磊◎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明清时期的官员、学者撰述关乎日本的国情、史地的著作显著增加，到日本实地考察并且做出详细记述的现象也日益频繁。在某种意义上，明清时期正是中国加强日本史地著述和深入认识日本的一个转折点。本书由上编和下编两部分组成。上编主要是围绕明清时期出现的日本研究史籍，侧重于史学史和文献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史学方面的分析。下编主要是围绕明清时期日本研究史籍中所出现的对日认识问题进行分析，从史学作品中探究编纂者的日本观，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明清时代时人的日本观问题，从“日本地位和整体形象观”“日本人形象观”“日本政治观”“日本文化风俗观”等角度勾勒了一幅清新、有序的“日本观”图景。

本书适合对明清时期中日交流等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海东观：明清史学中的日本研究与认识 / 时培磊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6

ISBN 978-7-03-053731-7

I. ①临… II. ①时… III. ①日本-研究-史学史 ②史学史-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K313.07 ②K0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2040号

责任编辑：李春伶 耿 雪 / 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张克忠 / 封面设计：润一文化

联系电话：010-64005207

电子邮箱：lichunl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8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张：23 1/4

字数：346 000

定价：1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时培磊君又一书稿确定出版，一年期间内他可望出版两部著述，值得祝贺！当然，这不是一年内的研究成果，而是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在近两年内的修订补充工作。两书虽有着思维线索上的联系，但后书内容上有所扩展，学术上更深入一步，反映了作者是在具有开拓空间的议题上，锲而不舍地持续研究，不断前进。研究历史问题，理应有此“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理念，研究专题不宜过分分散，最好围绕一个系统问题，如剥笋、抽茧，深入而延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并非上乘的治学方式，尤其是尚处于“学术起步”状态的年轻学者，更须注意。

中日两国的联系在历史上源远流长。自隋唐时期，日本朝野就认识到中国的实际国情，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文化，都处于比日本大为先进的水平，遂主动加强了与中国的交往，中国朝廷与官员、学者，也逐步关注日本的国情、民俗，中日之间相互了解日益加深。但长期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考察为多，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往往依赖对方来人的介绍，缺少中国人士亲身到日本本土做实际考查。明代中期社会矛盾积累，上层政争趋于激烈，同时日本政局也动荡频仍，游离于政权控制之外的日本浪人与中国海寇、商业走私团伙，每有勾结，发展成武装、暴力的倭寇集团，在明朝江浙沿海等地区烧杀劫掠，进而造成显著的边患，引起国人对于日本历史和国情的高度关注。明万历时期，值日本丰臣秀吉掌政，对外扩张意图膨胀，发生了中日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所有这些，都激发中国人士更加重视对于日本的了解和研究，

对日本国情、历史、地理、民俗的实地考察也逐渐起步，并且留下了若干著述。

清朝取代明朝之后，政权的变动并未打断历史文化的承续，对于日本的了解和认知仍然发展。特别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呈现出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之巨变，引起清朝官员与士人不同的观察与评议。整个日本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特色，不仅受到中国各界的关注，而且逐渐在学术层面上成为研究对象。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惨败，被迫赔款、割地，对中国朝廷和士人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仿照日本明治维新而变法图强的思潮兴起，关乎日本的史籍遂接踵而生，在学术深度、内容广度上都超越以往。可见中国学人对于域外国度历史与现状的关注，往往是与国际关系的发展密切联系。近代东方各国共同面对西方政治、文化力量的冲击，中国与日本的反应有很大区别，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在应对西方的同时，不得不同时关注东海邻国的动向，彼时，中日关系纠结于整个国际格局之内，不同于其他任何两国的双边关系。因此，考查和总结明清时期特别是清季以来中国学界对日本的认识进程，既有学术价值，更具现实意义。

时培磊君的这部著述，分上、下两编，上编首先梳理明代以前各种皇朝正史中的日本专传，以及正史之外各种史籍中关涉日本的内容，表明自古以来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随后详细论述明代和清代出现的研究日本之史籍，作整体把握下具体的阶段划分。例如，作者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清初至清、日建交前夕。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冷淡，除个别物资的贸易外，官方层面很少交往，中国学界研究日本的著述虽少，但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如《明史》等官修史籍包含了专门的日本记述，私家撰著则有翁广平《吾妻镜补》等名作，可见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并未废弛。第二阶段始于中日两国建交，即明治维新中的公元 1871 年。此后 20 余年间，产生了多种高水平日本史著与日本考察报告，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韬的《扶桑游记》、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和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等等。在这个时期，由于明治维新的举措引人瞩目，清人相关的记述和评议颇多，散见于各种文籍。甲午中日战争开启了清人研究日本的第三阶段，以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王先谦《日本源流考》为代表作。前书经世致用，以日本的范例鼓动维新变法；



后者观念上趋于保守，然而在清理史料方面颇显功力，全书用编年体勾画出日本历史发展的清晰线索。作者将清代中国研讨日本之著述，置于历史阶段性的分析，联结国情与国际关系的背景，思路明晰，认识中肯，值得赞许。

下编论述明清两代的“日本观”，即中国人士对于日本历史、国情的观感与认识，其中包括对日本的整体形象和整体地位的感触和评议，对日本人的形象即素质的描述和判断，对日本国家之政治机制运作的评价，对日本社会风俗的看法等等。下编大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这项内容是本书作者的独到安排，立异开新，极具学术特色。

笔者认为：中国人士的“日本观”，是极其重要而又具备迫切现实性的大问题。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从未中断，自7世纪以降，日本锐意学习中国的政制、经济、文化、技艺，仿从中颇具创新，塑造了在上世界上相当独特的社会体制和文化特色。时值近代，日本又充当了向中国大量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中介甚至捷径，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国颇具声势的变法维新运动，直接受到日本的影响，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运动也是在日本酝酿和积蓄力量。20世纪30—40年代中，日本当局打着“大东亚共存共荣”的幌子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犯下滔天罪行，这是历代以来中日关系史中最为严重的一节。然而这一时期，也不乏部分日本人士投身于中国的抗战事业，例如尾崎秀实（1901—1944）、中西功（1910—1973）、绿川英子（女，1912—1947）等一大批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勇士，为世界反法西斯正义战争作出巨大贡献，有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近现代的中日关系，恩仇纠结，日本观已经不能以笼统、单一的目光来面对和思考，应该充分认识其多面性、复杂性。而辅助我们形成正确的日本观，除了先进思想体系的指导而外，直接明清以来中国的各种日本观也起到一一的参考作用，这就是时培磊君在本书中特别研讨此项课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当确切得知时培磊君的大作年内将在科学出版社刊行之际，京津冀的大地，已经是春潮漫野。时至五月，华北最高气温往往超越江南，处处红飞绿舞的景象，正好借喻史苑的学术繁盛。时君赶上一个文化环境十分优越的大时代，置身于一个多获支持的好单位，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所以能够学术上多出成果、出高水平成果。这并非是说其著述已经尽善尽美，

笔者对于时君，尚有文笔需要进一步历练，眼界应当扩展，思路亦可拓宽，研讨范围有待扩大的期望。而这里主要还是应当正面肯定这部著述取得的学术进展，正如在花园化的城市建设中仍可以发现不惬意之处，但不能抹杀环境日益改善的趋向。谨填词一首，既勉励时君，也对史学界之中日史学比较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迅速发展，致以由衷地点赞。

苏幕遮

时培磊君著述出版寄意

草萋萋，林郁郁，细雨明辉，洒向无垠绿。
秀色浓浓浓可掬，敢问东君，美景谁培育？

大和文，中国牍，点化融通，史苑添书目。
恰若飞来花一束，新意盎然，随处飘香馥。

乔治忠

2017年5月于南开园上思斋

前言

中国史学素称发达，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曾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①中国史学的发达不仅体现在对于本国历史的记载上，对于域外史地的记载也是丰富多彩。时至今日，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上古历史的书写尚需依靠中国史籍的记载来完善，如柬埔寨要研究吴哥时代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元代周达观所著《真腊风土记》。而在中国史籍中，所载域外史地内容较多的当数日本。

从《山海经》开始，中国史籍中就出现了记载日本的内容。其后历代史籍中记载日本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各种史籍中有关日本史地和中日交往的记述频繁出现。特别是正史中有关日本的传记，其记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不啻为一部系统的日本史。中国史籍中对日本较为全面的认识始于《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不到两千字的文字详细记载了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俗的状况，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较为清晰的日本观的体现。随后这一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中国人的日本观，大批史书都沿袭了这篇文字中的说法。一直到中日文化交流繁盛的隋唐时期，中国史籍中关于日本记载的内容才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大批遣隋使、遣唐使带来了日本的信息，也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日本认知。特别是在当时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日本的形象和地位都是与其他“蛮夷之邦”有所区别的，这从他们的诗作以及当时相关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史籍中可以窥见端倪。随着宋代中日民间贸易的繁荣,更加丰富了中国人的对日认识,并充实了史籍中关于日本的记载。而后元军的两次征日战争又阻隔了中日交流的进程,史籍记载的内容与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都受到影响。

明清时期掀起了对日研究的热潮,其中以明代中后期和清末为两个高潮阶段,出现了大批专门研究日本的史籍,对于日本的研究和认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明初的海禁政策使得中日之间处于讯息封锁的状态,而到倭寇问题发生之时,明朝人便开始积极了解和研究日本。先是嘉靖时期“宁波争贡事件”后,定海知县郑余庆支持薛俊编纂《日本考略》,这也是现存我国最早研究日本的专书。随着倭乱危害的扩大化,出现了大批研究日本的著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舜功的《日本一鉴》,这是他亲自赴日考察后完成的史著,代表了当时中国对日研究的最高水平。明清鼎革之后,对日研究的进程放缓,只是清朝前期由于和长崎之间的贸易往来,出现了一些记载长崎贸易进而涉及日本的情况的史籍。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日关系也渐趋紧张。鸦片战争方才开始唤醒沉睡的中国,明治维新则将日本送上近代强国之路。中国日益落后且被列强欺凌的状况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渐强盛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清朝又逐渐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当中日正式建交以后,清朝开始派遣驻日使臣、海外游历使、官、私赴日留学活动也日趋增多,他们不仅亲自观察日本,还尝试研究日本的强国之路,其中不少人都留下了研究日本的专门著述。通过对日本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使得清末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对日本有连续的、系统的历史记载,以至于日本上古史的某些问题都需要借助中国的史籍来解读,这种史学现象十分值得注意和研究。尤其是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专门研究日本的史籍,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十分独特的现象,其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一、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

就学术界已往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于明清时期记载日本的史籍已有不少



的个案研究，一些研究中日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论著中也有涉及，特别是探讨中国人日本观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是对明清时期有关日本的史籍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述尚付阙如，对于一些史籍的挖掘也尚欠深入。本课题的研究试图从史学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这一史学现象进行探讨，并就其中涉及的日本观问题作出分析。当然，这一探讨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现将学术界的先行研究状况回顾如下：

首先，从20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对明代有关日本的史籍进行梳理和研究的论著。缪凤林的《明人著与日本有关史籍提要》（《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第2期，1929年10月）中围绕《日本考略》《日本图纂》《筹海图编》和《经略复国要编》四部史籍进行论述，探讨了其版本内容、史料价值和日本认识等问题。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①（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柳诒徵《明代江苏倭寇事略》（《国风半月刊》2卷第8期，1933年）等，重点研究明代的倭寇问题，其中也谈到了明代中日关系史的问题。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禹贡半月刊》2卷第4、6期，1934年）中分别简要介绍了明代多种御倭类史籍。王婆楞《历代征倭文献考》（正中书局，1940年）中征引了从秦汉至明代的文献，分为德化、向化、携贰、力征、勘患、制议六大部分展开分析。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1985年）一书中，不仅探讨了正史中的日本传记问题，而且还着重分析了《日本考略》《筹海图编》《日本考》等几部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陈小法《明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中对明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诸多个案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也有对明代研究日本的史籍中体现的日本观问题的研究。

论文方面，王铁钧《明代的倭患与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讨论了明代日本学研究的勃兴原因并论及其对学术发展之影响问题。李小林《明人私撰日本图籍及其对日本的认知》（《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浅论明朝人认知日本的局限性》（《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侯继高及其〈日本风土

^① 按：该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重新整理于2014年出版，列为《民国文存》第63本。

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三篇文章,既从整体上分析了明代日本研究史籍的成就和不足,又对《日本风土记》等个别史籍中体现的日本观进行了评析。陈建平在《〈日本考〉所见的日本婚葬礼俗——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一文中,分析了《日本考》中对日本婚姻礼俗和丧葬礼俗的记载,认为此书所体现出来的关于日本民俗、民情等文化史、民俗史方面的认识价值,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外还有吕万和《我国近代研究日本的奠基者及其著作》(《历史教学》,1983年第1期),王守稼《研究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珍贵文献——兼评复旦藏嘉靖本〈筹海图编〉》(《史林》,1986年第1期)、赵刚《晚明有关日本的著作》(《故宫博物院》,1992年第4期)、汤开建《〈日本一鉴〉中的葡澳史料》(《岭南文史》,1995年第2期)、朱鉴秋《〈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及明代中日海上航路的研究》(《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李恭忠《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孙果清《明朝抗倭地图:〈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地图》,2007年第2期)、李丽《浅析〈日本考〉中的社会风俗》(《沧桑》,2010年第6期)、童杰《郑若曾〈筹海图编〉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时培磊《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及其特点》(《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郑永常《郑舜功日本航海之旅》(《国家航海》,2014年第9辑)、马先红《薛俊的日本观——以第一部日本研究的专著〈日本考略〉为中心》(《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9期)、时培磊《侯继高〈全浙兵制考〉及其与〈日本风土记〉的关系》(《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等,都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亦有博硕士论文作相关研究,如朱莉丽《明代中国人日本观初探》(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张冬冬《明代日本文献修纂研究》(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王晓颖《谢杰与〈虔台倭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杨晓燕《嘉隆万时期明人日本观研究(1522—1619)——以明人私修日本著作为中心》(江苏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夏欢《郑舜功与〈日本一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翟正男《邓钟〈筹海重编〉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时培磊《明清日本研究史籍探研》(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童杰《明季御倭史籍研究——以〈筹海图编〉与〈日本一鉴〉为中心》(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等。

台湾学者郑樑生所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2004年,第1—13册),其中收录的《佚存日本的〈全浙兵制考〉》《郑舜功〈日本一鉴〉之倭寇史料》等文章对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进行了分析,另外的一些文章以及探讨明代中日关系史的文章也都具有启发意义。

日本学者石原道博曾著有《日明交渉の開始と不征国日本の成立——明代の日本観(一)》(《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4号,1954年)、《日明通交貿易をめぐる日本観——明代の日本観(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5号,1955年)两篇讨论明代日本观的文章,主要是基于明代的史籍而得出的认识。日本学界关于明代《日本考略》《日本一鉴》《日本风土记》等都有不少研究,侧重于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其中《寄语略》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均见书末参考文献,此不具列。

其次,研究清代涉日史籍的论著有:钟书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一书中,对罗森、王韬、黄遵宪等人的涉日著述及其对日认识进行了研究。王晓秋在《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中,对康有为、黄遵宪、顾厚焜等人的涉日著述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分析了日本观与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状况。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对清末民初直隶地区赴日考察官民的日本观进行了介绍。郑翔贵《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从报刊的视角分析了晚清时期中国的对日研究及日本认识。

相关的研究论文有:佐藤三郎、郑海麟《明治前期中国人研究日本的书》(《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陈华新《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王魁星《关于康有为写〈日本变政考〉的两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王青芝《王先谦的史



学成就及思想与观念》(《船山学刊》, 2008年第2期)、张群《傅云龙其人及其著述》(《河南图书馆学刊》, 2005年第5期)、王宝平《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征引文献考》(《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08年第2期)、王宝平《〈策鳌杂摭〉: 首部晚清民间文人日本研究专著》(《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年第4期)等等, 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史籍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黄遵宪《日本国志》在清人日本研究史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相关研究成果颇丰。较早展开系统研究的是王晓秋《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近代史研究》, 1980年第3期)和陈宗海《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史学史研究》, 1983年第3期), 此后, 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和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年)对《日本国志》的版本、内容和思想等方面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陈其泰《简论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时代价值》(《史学史研究》, 1988年第6期)和伊原泽周《〈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近代史研究》, 1993年第1期)又从时代价值和编纂缘起等方面对相关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推进, 李长莉《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近代史研究》, 2006年第2期)则通过在台湾发现的档案文件考证出了李鸿章及总理衙门阻碍《日本国志》刊行的历史真相。围绕《日本国志》的研究成果几乎形成了一门“《日本国志》学”, 因此, 有学者对《日本国志》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 如孙颖《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广州大学学报》, 2004年第12期)、管林《近百年来黄遵宪研究的回顾与期望》(《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4期)、黄小用、王华《黄遵宪研究述评》(《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2007年第1期)、黄胜任《一百年来黄遵宪研究述评》(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郑燕珍《1994—2004年黄遵宪研究论析》(《嘉应学院学报》, 2008年第5期)等。此后对黄遵宪及《日本国志》的研究除了孔祥吉《黄遵宪若干重要史实订证》(《清史研究》, 2010年第2期)和王宝平《黄遵宪〈日本国志〉清季流传考》(《文献》, 2010年第4期)之外, 并无突破性的进展。



日本学者石原道博对翁广平和黄遵宪的对日研究进行过系统的探讨，如《鎖国時代における清人の日本研究（上）——翁広平の日本国志について》（《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紀要》人文科学，通号 16，1965 年 11 月）、《鎖国時代における清人の日本研究（下）——翁広平の日本国志について》（《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紀要》通号 17，1966 年 12 月）、《黄遵憲の日本国志と日本雜事詩（上）：清代の日本研究・第三部》（《茨城大学人文学部》文学科論集，通号 7，1974 年 2 月）、《黄遵憲の日本国志と日本雜事詩（中）：清代の日本研究・第四部》（《茨城大学人文学部》文学科論集，通号 8，1975 年 3 月）、《黄遵憲の日本国志と日本雜事詩（下）：清代の日本研究・第五部》（《茨城大学人文学部》文学科論集，通号 9，1976 年 3 月）等。实藤惠秀所著《明治日支文化交渉》（光風館，1943 年）对姚文栋的对日研究进行了探讨，并且分析了姚文栋和黄遵宪的关系。日本学者对于黄遵宪的研究也成果颇丰，管林《黄遵宪研究在日本》（《光明日报》1981 年 6 月 28 日第 4 版）、伊原泽周《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等对此作了介绍。佐藤三郎《中国人の見た明治日本：東遊日記の研究》（東方書店，2003 年）一书，讨论了清末时人所著 12 部东游日记。浦地典子（Noriko Kamachi）《中国的改革：黄遵宪与日本模式》（*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将黄遵宪的对日研究活动及其日本观置于中国近代化改良活动与日本近代化模式的比较视角中加以考察。佐佐木扬在《清末中國における日本觀と西洋觀》（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 年）中以李鸿章为中心探讨了同治年间官僚的日本观，以及郭嵩焘的日本观，还有清末游历官们的日本调查情况。山口一郎在《近代中国の対日觀》（アジア経済出版会，1970 年）一书中，分阶段分析了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伊东昭雄、小岛晋治等人所著《中国人の日本人觀 100 年史》（自由国民社，1974 年）一书，介绍了从 1840—1972 年的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及日本人的认识。

此外，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成文堂，1998 年）对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和顾厚焜《日本新政考》进行了专门研究。汪婉《清末

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汲古書院, 1998年)对于清末日本教育研究的相关著述进行了考察。张伟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 中国初代駐日公使団の異文化体験》(柏書房, 1999年)对清朝首届驻日使团以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进行了系统研究。王宝平《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汲古書院, 2005年)对清代黄遵宪、姚文栋、王肇鎡、傅云龙、翁广平等人的对日研究作了深入的探讨。

最后, 还有一些从整体上对明清时期涉日史籍进行探讨的论著。汪向荣《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根据隋唐以前正史中的日本专传来分析中国人的日本认识, 分别从“东夷”族属、地理概念、政治制度、上层建筑和风俗习惯等四个方面来进行了论述。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对古代文学著作中呈现的日本形象进行了分析。朱亚非《明清两度“日本研究热”观察与比较》(《山东师大学报》, 1997年第5期), 分析了明清时期日本研究热潮的各种表现并对形成原因进行了比较研究。

日本方面的研究有: 中山久四郎《支那史籍上の日本史》(雄山閣, 1929年), 对涉及日本历史的中国史籍进行了分析。岩井大慧《支那史書に現はれたる日本》(岩波書店, 1935年)从中国史籍出发来探讨了日本历史问题。

市村瓚次郎《支那の文献に見えたる日本及び日本人》(《東方文化》第1号, 1937年7月)从文献的角度分析了日本观问题。田中健夫先后发表了《倭寇図雜考——明代中国人の日本人像》、《倭寇図追考——清代中国人の日本人像》和《倭寇図補考——仁井田陞氏旧蔵書について》(分别载《東洋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篇》第41、46、47集, 1987、1992、1993年), 以图绘资料为中心, 对明清中国人的日本像及日本观问题进行了解析。

此外, 武安隆、熊达云《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六興出版, 1989年)梳理了中国的对日研究史, 对明代对日研究的社会背景和主要代表作品做了介绍和分析, 并总结了中国人的对日认识; 对清代, 则主要抓住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认识, 以及戊戌变法时期所表现出的日本观进行分析。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年)从中日两国相互认



知的角度分析了明清研究日本的史籍，并从中日两国各自的角度考察相互认识问题，抓住了明代日本研究专著的特点，重点以地图和语言为例分析了明代中国人对日认识的深化。此外该书还分析了晚清士大夫的三种日本观，以及清末掀起日本研究热潮后的日本观的发展过程，并探究清末留日生的日本观由仰慕向憎恶的转变。石晓军的另外一部著作《〈点石斋画报〉にみる明治日本》（東方書店，2004年）主要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分析其所展现出的日本观问题。王勇《中国史のなかの日本像》（農山漁村文化協会，2000年）也介绍了明清史籍中所涉及的日本形象问题，按照隋朝以前朝贡时代的“宝物之岛”、遣隋遣唐使时代的“礼仪之邦”、元明时期的“海贼倭寇”和近代以来的“西学之师”四个阶段对中国人的日本观从古至今进行了解析。

欧美方面也有一些成果，如 R. Tsunota & L. C. Goodrich, *Japan in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Later Han through Ming Dynasties*, South Pasadena, 1951。此书主要是翻译了从《后汉书》的“倭传”到《明史》“日本传”的内容，并做了一定的注释和说明。其他一些研究中日关系史的著作，如 Marius B. 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 Co., 1975; Joshua A. Fogel,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M. E. Sharpe, 1995; Akira Iriye,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Allen S. Whiting, *China Eyes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这些著作对本书的写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合以上学术研究史的回顾，学术界对明清时期有关日本的史籍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学术成果，这是本书讨论得以开展的重要学术基础。总体来看，以上研究对于明代日本研究史籍的分析主要围绕倭寇问题而展开。清代主要集中于黄遵宪及其《日本国志》的研究上，变成了一种综合研究的课题。其他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末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以及中国人如何认识世界的历程。因此可以看出，对于明清时期史学中的日本研究尚缺少一种史学发展视角的分析，对于日本观的研究也有待深化。

本书从中国史学中域外载记研究的背景出发，探讨中国的日本研究史学